

对于铅字的回忆,原本是尘封在记忆深处的,只是因为看到了一位作家朋友的散文,才被勾沉了出来,原来我对铅字,竟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。那位作家的散文,写出了作品变成铅字之后,那种激动与幸福的感觉,以及读者对文学报刊的尊崇,对此我深有同感。但若再深入一层,我在一家新闻单位干过排字工种,还亲眼见到自己的一首诗被排成铅字发表,并且后来还做过近四十年报纸副刊编辑,这种经历不会是人人都有的吧。

中学时期,我就喜欢上了写作并尝试投稿。那时,天津人民出版社有一本期刊叫《革命接班人》,里面有几个页码的文艺作品,是专门面向中小学生的。我曾拿着自己的习作送到编辑楼,接待我的负责人,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。之后,我受电台广播小说的启发,在用废旧牛皮纸装订的草稿本上,写了一篇小说,大约有两万多字,是仿照中篇小说架桥完成的,内容是写一个小学生练体操,被体操学校录取后迅速成长,以骄人的成绩为国家争得了荣誉。再后来,我利用学工劳动的间隙,写出了几十首诗歌,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写在雪连纸上,装订成一册手抄本诗集,起名《火红的战旗》。

这些学生时代的写作,虽然是奔着发表去的,却最终都未能转化为铅字,刊印在出版物上,不过我早早就立下了心志,努力实现自己的写作理想。正是那本钢笔字抄写的诗集,给了我难得的机遇,班主任老师向到学校招工的新闻单位工作人员特别举荐了我,说他的这个学生喜欢写诗,并且有“作品”。后来,这中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,我还为此被叫到学校作过一次特殊的面试,而之前我并不知道内情。后来我接到分配通知,得知自己被分到天津日报社工作,内心是怎样一种兴奋,如果我没有那样一册“诗集”,班主任老师也不会那样有底气。

### (一)

到天津日报社报到的日子,是一个刻印在心底的时间:1975年10月8日。我穿上的确良绿军衣(当时的逛衣),骑着自行车来到位于鞍山道上的天津日报社行政楼,到人事处办理了相关手续,正式走进了这家市委机关报。经过一周时间的集中学习,我们这批共九名学生,被分到了除编辑科之外的不同车间。若干年之后,我才听说,负责我们入职学习的报社宣传科科长,曾拿着我的那本所谓的诗集,向其他学生表扬我的写作,还说我的钢笔字写得如何好。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,随着其他三名新同事,迈进了我人生的一片新天地——天津日报社排字车间,对外也称“排字股”,对内叫“排字房”。

排字车间在办公楼的第二层,宽大明亮。一踏进车间,我立时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,我从没有进入过如此整齐划一的工作场所,满车间没有别的,都是铅字,简直就是一座铅字的森林啊!我愕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,随着车间主任的引领,穿过一排列排列有序的铅字架子,就像置身于一座奇妙的宫殿,将整个车间转了一遍,我突然心生奇想,感觉这排字车间充满了奥秘——吸引着你用全身心去探寻,只要你有兴趣。就是那一瞬间的感觉,让我喜欢上了这里,并与铅字产生了一种亲近感,排字车间特有的味道让人闻过不忘,连同紧邻的铸字车间,不断有机器声与烟火味传送过来,这种气息一直留存在我年轻时的记忆里。

我对铅字的熟知,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,只是我当时还不了解《天津日报》的创办史,不知晓曾从《天津日报》走出去那么多新中国新闻史上的名人,特别是文艺副刊的创办者郭小川、方纪和孙犁。每当初,我们懵懵懂懂地进了新单位,身边的同事都统称李师傅,既有时代特征,也代表了一种尊重,正是因有这样的师傅们帮教,我们才逐渐形成了感知。

进入到排字车间后,我们这四个新学徒,统一由一位李姓师傅带领,在我的印象中,这位李师傅始终热情、和蔼,说话和和气气,从未跟我们发过脾气,不知道是不是车间领导跟他有过什么交代?他身高不高,干活时就系上围裙、戴上套袖,还要架一副白框眼镜,显得很有学问。是这样的,排字工人大都是识文断字的文化之人,否则怎么能胜任印报、出版的工作呢!

李师傅像我们介绍车间情况,事无巨细,如数家珍,好像整个排字车间的情况,都装在他的脑子里。我们跟着这样的师傅学徒,感到心安和踏实。他特意领着我们站到铅字架子跟前,具体讲解排字工作的要求和要领,听着他的传授、亲身示范,我们特别感动。应说,出了学校门,我们就踏进了报社门,也即迈向了人生与社会。我当时便恍惚地感到,李师傅就是我们入门的老师,四个大小伙子每个人都比他高出一个头,围绕在他的身边,好像我们不是他的学徒,倒像是他听话的孩子一样。

初次站到铅字架子面前,我感到一头雾水,这一面墙似的铅字架子,有一人多高,上面的铅字是如何排序的,它们之间没有规律,我们多长时间才能够熟悉它们?李师傅看出我们面露难色,便指着铅字架子说道,你们不用紧张,车间里的这些铅字架子都是统一的,现在报纸上的文章正文,用的就是这种五号白体字,10.5磅(后来报纸多次改版,字号多有变化,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报纸容量)。还有有拼版时要用的标题字,也分字体和字号,与难检字一起在车间后面的架子上。现在,你们就尽快熟悉字盘里的字吧,争取能够早一天上岗排稿。

接下来,就看我们个人的努力了。每天一上班,我就站在铅字架子前“相面”,上下左右反复地看、念、记,恨不得只用一天时间,就把架子上铅字的位置全都记牢背熟。当然,着急是不行的,要把心踏下来学。感觉到疲惫的时候,我就借着琢磨铅字架子解乏,发现这一个个铅字堆积起来很有分量,所以铅字架子都是呈A字形摆放,使之能够均受外力,它们一排列排整齐划一地伸向车间深处;每副铅字架子都是由十五个规整的方形木盘组成,上面六个,下面九个,中间是标点符号,有两寸宽的探出部分放置铅条及排字用的手托;木盘里排列有大小不一的竖格,铅字就根据字的标识装在里面;这样的铅字架子一列三组,

成若千趟,便于前后左右都能排字;除了常用字的铅字架子,还有黑体、楷体字等的字架子,以及用于制作标题的各种字号、字体的架子,如小初号、大初号,宋体、宋体等,包括拼版时必用的种类繁多的铅条……每天上班八小时,我就在这铅字的海洋里遨游。

背了几天的铅字架子,基本记住了常用字的大概位置,这十五个字盘里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一个铅字,它们不是按照偏旁部首排列,也不是以汉语拼音为序,而是将使用频率高的字和词,放置在字架子的上方,伸手可及,这些常用字的字格也略大,用得多,里面装的字也就多,而不常用的字就相对少些,单独放在十六个字盘的右侧,是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。这样,就只能靠着死记硬背,才能记熟字架子上铅字的位置。我们几个人也会互相询问,看谁能记得更多、更熟练。虽然还不能指哪打哪,但磕磕绊绊地也能记得一些字时,我就在心里编几句话当稿子,试着去拣字,致使兴趣大增。

看到我们这样用功,有一天,李师傅告诉我们,你们可以试着排一排稿了,看看自己拣字的熟练程度、时间快慢。于是,我们学着师傅们的样子,像模像样地拿起手托,走向铅字架子。那时报纸的铅字排版都是按栏数划分,一块整版分为九栏宽,每栏十三个字,栏与栏之间有一个字的腰栏,所有预发稿件统一按两栏文发排,拼版时再根据编辑版式变化栏数。有意思的是,仅有一寸来高的铅字上面,都有一个小小凹槽,因为铸出的铅字都是反的,所以排字时只需对齐了这个凹槽,就不会出现歪字、倒字的情况。排稿前,这样的常识都是要知道的。我用左手握住手托,里面放上两栏宽的铅条,食指和中指夹着稿纸,腾出右手去拣字,一般都是看一眼稿,拣几个字,看多了怕记不住,还容易有误,标点符号也不能出错。师傅们可不是这样,他们经验丰富,快手每小时可排三千多字,看稿和拣字几乎是同步进行,有的师傅甚至手里同时能捏四个单字,排字速度奇快。

初次展示身手,显得有些手忙脚乱,我举着手托,夹着稿纸,两只眼睛不够用的,一会儿低头看看稿子,一会儿又侧脸瞧瞧铅字架子,既怕看错稿,串了行,又怕拿错了铅字,遇到一时找不着的字,就在字盘前面来回寻找,心里一起急,就更是找不到要找的字,只好去请教师傅。一篇三百字的稿件,停停顿顿地排下来,根本无法计算时间,就当是一次练兵吧。慢慢地,我终于能够独立排稿了,几乎每排一篇稿件,都需要仰脖弯腰、前后转身,但即使这样,仍免不了发生看花眼了、手托里排好的铅字乱了、往盘里掐活儿时铅字掉了,没办法,只好再重新排过。就这样,经过反反复复无数次的练习、操作,李师傅才点头答应,让我们上岗顶班了。每天的预发稿很多,老也排不完似的,编辑部总是喜欢多发稿,长期停用的稿件也是有的。排稿多了,质量就成了关键,排好的稿子用墨滚儿打出小样,连同原稿一起送至校对组,排字车间的楼上就是校对组,在房顶开凿出一个一尺见方的孔洞,安装上一副升降滑轮,将打出的初校样子装进小铁桶,上下传递起来非常便利。

稿子是排出来了,质量如何?在每份打出的小样上面,都印有排字者的姓氏,如果小样回来时变成“大花脸”,满是红笔画出来的差错,那是很丢颜面的。庆幸的是,我的排字速度、差错率,从一开始就是比较好的,老师傅们拼版时,喜欢用这样的稿子,不需要怎么改错就可以直接拼版。排字师傅们的认可,为我以后的工作赢得了赞誉。

### (二)

排字车间的工作实行两班倒,白天要排预发稿和完成预拼版,夜班则主要是为了当天见报的版面,每天都在强调调将上班时间往前赶,所以夜班师傅都是个顶儿个的好技术。1975年的冬天,车间通知我开始上夜班了,我像领到了新任务一样兴奋,这是仅仅熟悉排字工作的两个月之后。夜班是上夜间十二点整,单位里没有集体宿舍,我只好十一点半从家里骑车出来,一路夜幕。街道上寒风袭人,常有野猫、野狗突然蹿出,我从无惧色,更加快速地骑行。

我没有上夜班的经验,总是晚上睡一会儿觉再起床上班。排字车间的夜班是实打实的,待排稿、拼版工作完成,当天的几块版全部签完付印,我们还要分字,就是将排空的字架子重新填满,以备白天时使用,并将轧完纸型的铅字版拆散,标题字放回字盘里可以再用,正文用的五号字送回铸字车间回炉。此时,已经是凌晨了,天光大亮,在铅字架子之间来回穿行了一整宿,两条腿的腿肚子感到了酸胀,好在我那时年轻,并不觉得疲惫。我和师傅们结伴去过对过营里的食堂吃早餐,那时铅作业每天有四角钱的营养补贴,照例是要喝一杯牛奶。我从单位回到家里刚好八点钟,家人都去上班了,我正好睡觉。

转眼到了1976年。这一年,发生了一些国内大事件,这是一个应该被记住的年份——周总理、朱德委员长、毛主席先后病逝,人们的心情无比悲伤,新闻单位肩负着繁重的宣传报道任务,排字车间是出报的重中之重,又是极敏感的工作区域,不容有任何闪失。那时期的排字车间,师傅们仿佛都置身于无尽的哀痛之中,尽心尽力地完成好本职工作,避免出现任何纰漏。每当有重大新闻,车间里就会及时作出部署,师傅们都是从白天就开始紧张工作,全力以赴。我记得清楚,每次头版的重大新闻,都是由公认技术最好的王、郑、冯等几位师傅轮流“主拼”,大家均以他们为中心组版,协调有序。有一次,车间接到紧急任务,赶拼一块转天见报的整版新闻,这块版需要制作通栏标题,肩题、主题、副题加起来多达

好几行,这类通栏标题的字号也大,厚度起码有多半尺,做版的难度很大。在操作台前,王姓师傅将通栏标题一丝不苟地调整好,试了试,一双手刚好能够抓起来,他稍加用力,就听“咔嚓”一声,便知道做好的标题已稳稳地装进了版心里,这一声重重的脆响,使大家悬着的心瞬间落了下來,关键时刻还是老师傅,还要靠过硬的技术。

后来,我经常听人称呼王姓师傅为“万能”,这其中有多少含义我说不清,但仅就技术、认真和工作态度,我是认可这样的称呼的。我也慢慢看到了,这种铅字通栏标题,不同于锌版标题的制作,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,多一根铅条都装不进去,少一根铅条便会在版里晃荡,还有可能错位或乱行。另有一位极细心的李姓师傅,每每签好付印的铅版在上轮转机前,他都要用特制的T字形钥匙锁紧版心,然后横竖吊线般地检查,就怕影响印刷质量。

如此高超的技术能力,着实令人羡慕。车间里的每个职工,都是党报的一名成员,报纸上的

## 我与铅字

宋曙光



一个标点、一个字、一篇稿,直至每块版面,都洒有排字师傅们的辛勤汗水,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新人,为此我一直怀有一种荣誉感。一天早晨我下了夜班,将当天的《天津日报》夹在自行车后衣架上,这天的报纸一版刊有朱德委员长逝世的重要消息,在停车等红灯时,路人纷纷向我行注目礼,似乎在问:报纸这么早就印刷出来了?

特别难忘的还有唐山大地震。地震当天我是白班,车间里的震况我没有亲眼看到,听说铅字架子震损得不多,基本没有影响后来的正常工作。震后的转天我去上班,马路上已满是砖头瓦块,路面阻塞,自行车都难以骑行了。报社行政院里的横梁顶掉了下来,深深地斜插进地面。这里曾是一所名人府邸,称作张园,现今已成为文物保护单位。报社办公楼的第五层原只是一个帽顶,起着装饰作用,地震后成了危顶,砸掉后便符合其地成为四层楼的报馆。

排字车间里有位孙姓师傅,爱好写诗,称为工人诗人。我关注他,发现他的诗就是写在废旧的新闻纸上,字体很大,每有重大活动,比如抗震救灾等,他都会写诗参与,写好后就交给来发稿的文艺组编辑。这引起了我的兴趣,我也想要像他那样写诗投稿。1976年10月,党中央一举粉碎了“四人帮”,举国欢庆。我利用晚上时间赶写了一首诗歌,用稿纸抄写出来,上班时,就送到了编辑部文艺组。地震之后,报社办公楼因有危情,

编辑部便临时搬到与报社相邻的一所中学办公。我将诗稿交给了文艺组的那位编辑,现在已然记不得了,但那是我第一次给报纸投稿,那首诗歌是否能够发表,成了我的心病,天天惦记着文艺组发排的稿件中,会不会有我的那首诗。

没过几天,我在文艺副刊的预拼版里,赫然发现了自己的那首诗,我强忍着心脏的急跳,快速地读了一遍,又看了看署名,心里无比高兴。这是首只有四节、十六行的小诗,如愿以铅字形式出现,其意义非同寻常。那时候,我已经关注报纸的文艺副刊了,排过文艺类的稿子、拼过文艺副刊的版面,知晓了一些经常见报作家的名字和作品,我向往这块园地。这期文艺副刊版很快就签付印了,然后是轧纸型、上机器印刷……我目睹了这首诗见报的全过程。多少年过去,那首铅排的小诗,还总是在眼前浮现,散发着铅字所特有的光晕和墨香。

### (三)

冬天时,我被从排字车间抽调出来,加入到报社组织的抢险队,参加抗震救灾,跟随理论部一位正在等待落实政策的老编辑,去修缮一处报社职工宿舍。这种活我们都没有干过,具有一定的危险性,我们每天穿好工作服,戴上安全帽,攀上高高的脚手架,绑扎铁丝、搬砖运灰……后又跟随广告处一位同志,到行政院的后院去倒腾燃煤堆,今天运进,明天拉出,一直干到当年年底。

1977年元旦过后,我回到排字房上班。刚走进车间,车间主任就迎向我说:小宋,你去一趟人

事处吧。我即刻来到了行政办公院,此时,整个院落里已经建起了若干排临建棚,我找到挂有人事处牌子的简易小房,推门进去,向一位老同志打招呼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位老同志即是人事处处长张启明,是一位资历很老的进城干部。他笑着对我说:好啊,小宋同志,你被调到文艺组工作了,现在就去那里报到吧。我当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,有些木讷,又有些紧张,还有一些激动,但张启明同志那张和蔼的笑脸,却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我喜爱文学,尤爱诗歌,能够到报社文艺组工作,曾经是我的梦想。那天报到的时候,我见到了文艺组组长王干之,这位从报社编委岗位上离休的老编辑,已于2023年11月24日因病离世,享年97岁。我当年的那首诗歌,就是由他签发的吧。那天,他介绍了文艺组的情况,让我多读书、多向老同志学习。他还特别提到了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的创办者孙犁,问我是否读过孙犁的《荷花淀》。在当时,我是非常敬重这位王组长的,看到他每日伏案看稿、改稿,有时也写随笔和诗歌。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儿童小说。我还知道他曾和孙犁一起工作过,同住在一处报社宿舍。很多年过后,当我主持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副刊工作时,每到春节都去看望他,还专门约请这位老主任,写过怀念孙犁的纪念文章。

这些都是后话。到文艺组报到后的当天下午,我回到了排字车间,向师傅们告别,从他们的眼神里,我看不出不舍和羡慕,我感谢这些曾经带过我的工人师傅,虽然仅有一位师傅是专门负责带我的,但工作中有了问题,无论问到哪位师傅,他们都是毫无保留地传授,让我这个学徒如沐春风。随后,我走到那副自己经常排字的架子前,抚摸着整齐的字架子,浏览着字盘上已经相当熟悉的铅字,心里不禁升起留恋的情愫。在更衣室,我取下工作服,将套袖卷起来,关上了衣橱门。遗憾的是,我没有从车间取走一个手托、一只镊子、一把铅字尺。我想,我没有带走任何一件物品,是想把自己对这段生活的念想留在这里吧。

我进入报社排字车间的时间不长,既没有拜师,也就没有出师一说。后来才知晓,报社是想从我们这届学生中,继续培养自己的编辑记者,上一届招工之后,就选拔出几个人表现突出的苗子调进了编辑部,我们这届仍然如此,先分到车间,是为了让我们熟悉报纸的整个印刷流程。可在当时,我哪里会知道报社领导的意图啊,只能无条件服从调动。

虽然调离了排字车间,但编辑工作却离不开排字工种,除了平日与排字师傅们头头碰面,拼版时还是要去排字车间的。我当了文艺编辑后,就经常拿着画好版式的小黑板去拼版。在排字车间,我对师傅们自然会有一种亲切感,有些活儿我还帮着一起干:有的文章出现“顶头点”,我就抢着换成对开标点;改错时,我先到铅字架子上去拿好字,尽量不让师傅来来回;版面拼好了,我主动准备好墨滚儿和纸张打样子……每次画版式时,我尤其认真仔细,在小样上精准计算,我知道如若数字计算不准,就会给师傅带来麻烦,还会耽误拼版时间。铅字印刷时期的报纸,讲究合栏合行,差一点儿都不行。当年,华北五报(《天津日报》《北京日报》《河北日报》《山西日报》《内蒙古日报》)定期举办报纸质量评比,其中有一项就是用尺子量报纸版面,有对不上行的情况便会减分。在后来改用计算机拼版时,年轻的操作者不再顾忌什么栏的概念,想怎么走文就怎么走文,编辑也无需再提前画好版式,只需告知拼版者一个大概就可以了。我对铅字的怀想,从那时候开始,就只能借助于旧报纸所散发出的油墨香了。

### (四)

灾情后期,排字车间从办公楼里搬到马路对面的搪瓷厂原址,原先的排字车间还是因为地震受到了影响,从此再也再无搬回,被我视作铅字森林的奥秘之所消失了,永远找不回那种绕梦萦梦的感觉了。我的师傅们也开始先后退休,在我的记忆里,他们都是和蔼可亲的,从来没有指责或批评过我们。他们大都有热情,有急活时都是抢着上,每当这个时候,架子之间都是穿梭的身影,师傅们排字都有自己专用的手托,最普遍的是木质的,不如金属的得心应手,最讲究的是黄铜质地的。一篇篇稿件往往被分开来排,大家分散在各自的架区间,金属手托里同时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,那是熟练的师傅们在排稿时的习惯动作,铅字随着拇指的带动而跳跃。据老师傅回忆,在旧时,工厂主为了监督工人们干活,必须让铅字发出声响,避免有人偷懒。在万家灯火夜色里,铅字发出的声音很像是一种乐器在弹拨奏鸣曲,动听极了……当我回忆起这个细节的时候,耳边似又响起那熟悉的铅字声,手指也感应

似的在微微点动,当年那情景真的让人动情。

排字车间给了我最初的劳动之乐,有了认真、仔细、严谨的概念。排字车间是报纸出版的第一道工序,差错有时就是从排字到校对再到付印一路下来的,如果从排字就干净无误,那么出错率就会降低很多。在那个时期,有些敏感的字词、政治术语、国家领导人的名字等,都是连铸在一起的,就是为了避免出错,排字时倒也很方便,一伸手就是好几个字。报社主管的《文艺增刊》,就曾将一位元帅的名字排错一个字,那期杂志被全部收回,粘贴上正确的字后再发行出去,虽然费时费力,但避免了负面影响。错植、误植铅字都是非常危险的,白纸黑字就是证据。

排字车间与铸字车间是姊妹车间,它们的位置就如同房屋的里外间,我经常到铸字车间去,联系铸字之事。有一次,铸字工人推着一车新铸好的铅字,刚进排字车间,不知何故,沉重的手推车歪斜了一下,倾倒出了小半车的铅字。新铸好的铅字都是装在特制的木盒里,一字一盒,掉出来的新铅字堆在地上,银光闪烁,却是不能再收回去了,万一有一个半个的铅字放错了,就极容易拣错字,没办法,只好将散落的铅字铲起来重新回炉,对生产隐患不能有丝毫的含糊。

时常会想到,战争年代条件异常艰苦,印刷出版都是刻版油印,像孙犁前辈编辑《冀中一日》时,就是将二百多篇稿子油印出版,选好一篇刻写一篇,编成了四集,约三十万字。孙犁将看稿心得写成《区村连队文学写作课本》一书,油印了一千本。孙犁说:“在那种条件下,这本小书的印刷,简直是一个奇迹,那种工秀整齐的钢板字,我认为书法艺术的珍品,每一种的每一笔画都是勾勒三次才成功的……”油印工作被孙犁看得如此神圣,以至用了这样带有感情的文字来描述。从油印到铅印已是属于先进技术,但数字印刷又急速地改变了人们的认知,这是人类生活的进步。

我还想起,在排字车间时,稿件中如遇到疑难字或异体字,便没有字模子,也就无法铸造出铅字。这样,排字车间就专门安排了几位刻字师傅,有的盯夜班,有的上正常班,遇有偏僻字就请刻字师傅操刀刻字,刻刀刻出的字也是反字,这就要求师傅熟悉字体、字形,还要刀工娴熟,特别是在夜班,不能延误拼版时间。我有时喜欢到刻字师傅的那个小工作间观摩,在灯下看师傅的刀法,心里曾揣摩,以刻字师傅的工作性质、意义,是够得上“铅字工匠”之称的吧。

### (五)

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,《天津日报》终于告别了四十余年的铅与火,改铅字印刷为胶版印刷,排字车间宣告解散,那些具有纯熟技艺的老排字工人,全部解甲归田,报社成立了计算机操作的先进的激光照排车间,将党报印刷制版提升到一个新水平。我有幸经历了铅字和数字版两个印刷时期,经历了新旧交替的转型期。可遗憾的是,关于铅字的记载,文字的与图片的均告阙如。当年,我还曾建议撰写一部天津日报社社史,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讲,《天津日报》的创办、成长及发展,都可称为中共地方党史的一部分,许多原始资料和档案都非常珍贵,但后来终因多种原因而未能如愿,像老报人口述史这样的宝贵史料,也没有及时留存下来,甚为可惜。当今年代的年轻副刊编辑,在电脑上设计自己的文艺版面时,是否会想到他们的老同事们,曾经是与铅字打交道,提着用粉笔画好版式的小黑板,去排字间拼版的呢?

我是忘不了了,过去,现在忘不了,将来也是不会忘记的。铅字带给我的是一种缘分,记得那么牢靠、那么清晰,那么有烟火味。在人生漫漫的长途,有关铅字的记忆,已经像刻刀一般深深地刻印在了脑海里。那段短暂的生活,因为有那么多可敬的师傅们相伴,才让我有了至深的情感和记忆。排字师傅们对报纸印刷工作极其认真,有着较高的政治觉悟,不管是在岗期间,还是退休之后,他们对报社的情感依旧深厚。我是从他们中间走出来的一员,现在,终于能有一篇文章,写出他们默默奉献的身影,为我们这张党报存档。

不久前,在报社退休群里,得悉又一位老排字师傅去世了,令人伤感。这位卢姓师傅曾任排字车间副主任,当过骑兵,他文化程度不高,工作却很认真,行止都是军人作风,雷厉风行。有一段时间,每天下班后都要政治学习,都是他组织大家念报纸、读文件,他是负责。像他一样的老排字师傅,都是对党报的新闻事业作出过贡献的,他们的相继离去,既是一个时代的结束,更是后辈心中永远的痛。

像铅字这样微小的物件,在我的工作经历中,实际只出现过短暂的一年多时间,今天能够重新回到眼前,确是一件幸事,别具意味。那是青春的时光、青春的年龄、青春的向往,它们在生命的记忆里,属于闪光的时间段,哪怕仅是留有一点点记忆,都是无比珍贵的。人生中,毕竟流失得太多,像这样零散、细碎的回忆,如果不是偶然间被钩沉出来,恐怕真的就会遗忘掉了。如今,这些近五十年的记忆,即便是有些许模糊、误记,也仍然让我感到热血沸腾,倘若能从中找到几组镜头,穿越回到那些画面里,无疑便是生命中最生动的色彩了。

2024年4月下旬拟定

(题图照片为《天津日报》创刊60周年社史展上的铅字架子实物,但排列有变。)

### 编辑附记

今年是天津解放75周年,也是《天津日报》创刊75周年,同时我们也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。这75年间,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很多行业都经历了颠覆性的创新与改革。

天津这座历史遗存丰厚的城市,正在创造着新的繁荣与辉煌,《天津日报》记录并见证了这一历史进程,也因此丰富了自己的文化蕴含。

从“铅与火的时代”落幕,到进入“数字化时代”,数十年间的发展嬗变,均辉映着时代的光彩,折射出创新与前进的侧影。这是属于新老报人的共同财富,也是薪火传承,创建光明未来的希望。

《我与铅字》是本报高级编辑宋曙光以近40年报纸副刊编辑生涯为背景,通过亲身经历描写报纸铅版印刷时期的情景,更是以丰沛的情节、感人的文字,回顾了近50年前,《天津日报》铅版印刷工作的真实场景。作品中,作者对当年排字工种的追忆,对早期报纸铅版印刷细节的描述,对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缅怀,倾注了深切而质朴的情感。

近日,作者将原稿重新润色、补充,以《我与铅字》为题,交由本刊发表。这篇近万字的文章,以感恩之心、深情之笔,留住了记忆中那段闪亮的过往,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缩影,保存下若干珍贵的工作场景与细节,记载了一代代天津日报人为党的新闻事业作出的不凡贡献。

为此,本刊借发表《我与铅字》之际,向所有为党报工作付出过心血与汗水的前辈们致敬!